

## 宁波好书

## 问所来，探未来，皆见情怀

——写在《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出版之际



袁志坚

孙国平是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也是河姆渡文化代表性遗址——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支持者。2020年9月，我跟随宁波大学刘恒武教授到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拜访孙国平老师，并约请他写一本介绍井头山的书。当时，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甫一上市就引起关注。孙老师认真、诚恳地告诉我，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的工作量很大，他不能保证写作时间，但是会尽量完成一部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著作。

2023年5月，宁波出版社要申报2024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将这本书纳入到项目计划。征求孙老师意见时，编辑表达了出版社的粗浅想法：一是将内容定位为中华海洋文明探索的主题出版物，体现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二是将井头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联系在一起，梳理两处遗址之间的关系，不局限于井头山遗址。就我拟的“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这一书名，特意请教孙老师在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个书名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年到8300年，能否向大

众通俗地解释为中国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起点在8000年前，而且井头山是独特例证？《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的书名非常好，因为它明确地把良渚定义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早期王国。第二个判断，河姆渡文化是否来源于井头山文化？除了地理环境、地理距离的关联，怎么解释二者之间的文化过渡、文化兼容、文化传承问题？河姆渡的知名度、公认度已经很高了，它是中国长江流域乃至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典型代表，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将井头山作为河姆渡的祖源，不仅可以延长宁波史前文明的时间轴线，而且可以将浙东沿海这一独特的地理单元确定为中华文明最早走向海洋的文化带。第三个判断，“向海而生”的主体是在此区域内生产、生活的先民，通过对考古出土材料、古地理知识和史前遗址分布情况的解读，进而科学描述井头山、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无疑可以增加本书的人文色彩，让今天的读者能够“贴近”感受先民的智慧和历史的底蕴。孙老师会心一笑，他认为出版社已经吸收了他此前接受约稿时陈述的观点，这个书名站得住脚——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在立意上也站得住脚。我们的策划意图得到了孙老师的认可。此后，编辑在与孙老师的沟通中，处处能够感受到他的“春风大雅”。

2021年，井头山遗址发掘成果入选2020年度中国六大重要考古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消息传开，孙老师更忙了，但是他没有因为我的同事沈建国、徐飞、苗梁婕先后催稿而不快。熟悉孙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副热心肠。我们去考古工地“探班”，多次看到他亲自接待来自各地的考察访问团队，不厌其烦地讲解、答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出

生在农村，但是野外考古这门活，比当农民苦得多。因为热爱，他从中收获了许多乐趣，考古发现是一种乐趣，分享考古发现是另一种乐趣。2024年，《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于有结项时间要求，我们只好继续叨扰孙老师加快写作进度。孙老师坚持要反复修改，他很厚道地向编辑苗梁婕解释：“我白天干体力活，晚上才能干脑力活。”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偶然中有必然。孙国平出生、成长于慈溪，他的故乡恰好在河姆渡文化区。21世纪初，他主持发掘属于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海洋文化元素，并初步得出了河姆渡文化是在宁波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属于大陆稻作文化与海洋文化混合共生类型的结论。寻找河姆渡文化的来源，于他而言，是一种执着的念想。2013年10月，余姚三七市镇井头村的两名村民将洪水冲洗后在地上捡到的贝壳、鹿角碎片和少量陶片、骨器送到田螺山遗址考古驻地，他立即和徐志清、王永磊、卢小明等一起苦苦搜寻那些遗物可能出现的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他们从深埋地下7米以上的地层钻探到井头山遗址的考古文化层。2019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正式启动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一期项目。井头山遗址距田螺山遗址不到2公里，距离河姆渡遗址约8公里，后来的发掘结果基本证实了孙国平关于河姆渡文化存在祖源的判断。孙国平所提出的“古宁波湾”概念及其他推测，为我们认识上万年前的沧海桑田的变迁打开了考古学的想象力。

一本书可以释放作者的能量。《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不仅释放了学术能量，而且释放了情怀能量。古人所说的“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能量”。苏辙有一句名言：

“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孙老师在第一章“追本溯源的情结”里说：“考古学最大的意义，是增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句话，是情怀，是贯通在全书里的“气”，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后记》里所说的“初心与热忱”——“在分享专业研究心得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远近相依的海洋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多的敬畏与热爱”。问所来，探未来，皆见情怀。作为一个宁波人，孙国平老师对河姆渡文化起源的追溯，对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海洋文化发源头绪和传承脉络的梳理，蕴含着他对河姆渡文化发源头的使命感，也承载着他通过历史思考期待宁波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使命。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宁波发掘了具有完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史前文明遗址遗存，提供了中华海洋文明基因鲜活的关键例证。这本书，字里行间都是家国情怀。《大学》倡导所谓“本末始终”，启发我们在文明探索、文化寻根的基础上，阐述“向海而生”的依据，塑造“向海而兴”的格局。

一书在手，海陆回响。作者上下求索的勇气、纵横开阖的视野、极尽精微的辨别、条分缕析的论证，建立了全书的主旨坐标、逻辑结构、学理层次和知识锚点。书中穿插了大量的考古现场图片和环境图片、器物原始图片和复原图片、发掘位置图和地层剖面图、器物对比图表和结构示意图、区域地图和全新世海平面上升过程图，便于读者沉浸式“看见”8000年前先民生活的场景、故事和细节，进而形成从感性到知性、理性的认识跨越。

宁波，是中华海洋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也将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节点城市。我相信，《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能够给宁波读者带来强烈的共情力和共识力。

## 荐书



##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作者 王澍 王贵祥 方拥等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6年4月

回望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史，营造学社永远是一座值得铭记的丰碑。

1932年至1941年，以梁思成、刘敦桢为核心的营造学社成员，用脚步丈量河山，用纸笔测绘实物，行经190个县市，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古建筑考察之旅。他们用严谨的学术调研，为中国古建筑搭建起坚实的研究基础。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汇集了王澍、

王贵祥、方拥等11位建筑史与遗产保护领域的权威学者，以一人一古建、一人一文章的体例，循着梁思成等人的足迹，溯源先辈的考察与求索，拆解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密码，讲解中国古建筑知识体系及蕴含的东方审美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缅怀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建立了以实测考据为核心的古建筑研究范式。梁思成深耕《营造法式》等典籍，将文献考据与田野实测相结合，厘清了古建筑断代标准、木构抗震原理、空间布局逻辑，让中国古建筑真正建立在结构科学、形制演变、时代文脉的学术基础之上。

营造学社重构了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审美内核。梁思成认为古建筑不是单纯的土木构造，而是自然意境、礼制文化、人文精神的融合载体。从曲阜孔庙承载的儒家文化，到江南园林藏纳的文人意趣；从故宫轴线布局彰显的皇家礼制，到广汉古城祠庙、牌坊、会馆沉淀的市井伦理，梁思成跳出孤立的建筑形制研究，将古建筑置于历史文化长河中解读，为后世确立了“结构之美+人文之美”双重维度的古建筑审美标准。

先辈开疆拓土，后辈薪火相传。书中的11位学者，延续了营造学社的学术脉络，同时立足当代视角，实现了研究维度的延伸与学术体系的完善，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学术接力。

（推荐书友：林颐）



## 《人呐》

作者 莫言  
出版 北京日报出版社  
日期 2026年4月

说实话，对莫言先生的最新短篇小说集《人呐》，我是抱着极大的期待和热情翻开扉页的。可最终，多少有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小遗憾。莫言先生坦言：“希望大家能像刷视频一样刷小说。”对这句话，不同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而言，在当下铺天盖地的短视频中，真正有质量、有趣味、有价值的并不多。而之前一直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莫言，此次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部作品，不能不说是流量时代的

一次“就范”。

那么这部小说集究竟如何呢？从文字层面看，因是短篇体裁，所以言简意赅，且不失莫言式的“魔幻色彩”。全书共5章，收录81篇短文，有的用文言文写成，有的用白话文创作，有的最后还用了句“一斗闹主曰”。来对故事进行评论——有点类似于《史记》里的“太史公曰”和《聊斋志异》里的“异史氏曰”。莫言自道自己“有一些不像小说”，像不像小说倒也无伤大雅，读者更看重的并非外在，而是内涵。

开篇的《卖驴记》拢共千余字，写得很有水准，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市井智慧，即用“真话骗人”。事实上，“用真话骗人”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莫言观察到了，写出来了。我们虽也见识过，却不曾深思：这就是文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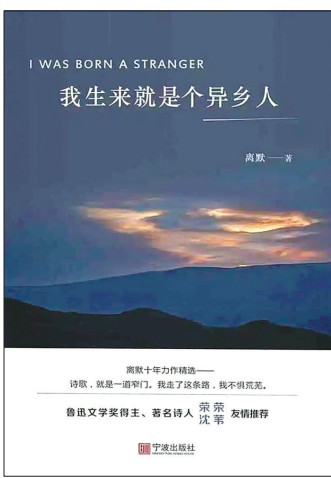
《坏种》也是一篇富有思辨价值的短文。“坏种”擅长通过陷害别人来为自己牟利，他更坏的一面则是“损人不利己”，只要别人倒霉，他就开心。全文最“荒诞”的是结尾，“坏种”在互联网时代风光了一阵后，渐渐销声匿迹。可有人竟开始思念起他，心里空落落的。“一斗闹主”据此云：“好人与坏种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时候，坏种的‘作用’比好人还大。”一句话，讽刺感拉满。

整体而言，《人呐》依然不失大家手笔，也符合流量时代人们追求“短、平、快”的阅读心态。

（推荐书友：瘦墨）

## 抵达真实的个人路径

——离默《我生来就是个异乡人》读后



飞白

不久前，宁波诗人离默带着新诗集《我生来就是个异乡人》，在宁波大学举办了一次关于诗歌翻译和多语种朗诵的分享研讨会。会上，英语、德语、法语、韩语齐上阵，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专家和学生们现场诵读，结合文学阐释和翻译，让与会者感受到别有韵味的诗歌美学浸润和异域文化熏陶。在聆听跨语种诗歌朗诵时，尽管我无法听懂，但从对方的微表情上，捕捉到他们对于一首诗、一种情绪、一个意象的真实反馈。我发现，因为语言的不同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对于解读一首诗或是欣赏一部文学作品，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时，有与会者谈到，离默的诗有一种国外诗歌的味道。我

暗自琢磨这代表什么又指向什么。其实，就是指离默诗歌的审美内涵、节奏表现有别于中国传统诗歌，前者关乎内容，后者关乎形式。巧的是，这跟她在诗集序言中阐释的“我生来就是个异乡人”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只不过“异乡”的范围更为遥远，延伸到国外了。

“写诗十年，这是我出版的第三本诗集。”离默说。这样的成绩对于绝大多数诗人而言，无疑是可喜的。我相信这离不开她对写诗这件事的执着——诗歌就像楔子一样，牢牢地嵌进了她的生命体。诗集分四个部分，前三辑是诗，最后是他人的评论汇总。有几个关键词可帮助理解离默的诗，它们是：孤独、挣扎、野性。

在西方现代诗歌中，“孤独”作为精神标识，已经从诗人的个体情绪升华为一种哲学状态和诗学方法，它是一种“意识中不涉及他人，而集中于自我观照”的状态。无论是《深夜站至福州》《荒芜的花园小径》，还是《唯有穿过浑沌的风》《我多么喜欢》，再到她序言中的写作回忆，似乎离默身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性，或者说将孤独转化为美学方法、哲学立场与创作本体的诗学主张。她在诗中沉寂孤独，打通观察世界、构建语言、抵达真实的个人路径。

第一辑的第一首诗写道：“那些幽微的光在闪烁/仿佛不是从路灯/散发出来的光芒。”诗人在旅途的站台上见到稀松平常的灯光，内心产生了迷思与幻象，这并非简单的“幻觉”，而是极致化的孤独体验的即时呈现。诗人没有因为孤独而消极，相反，在“现代人连呼救都无应答的绝对孤立”中，把它作为创作的前提。正如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所写：“你要爱你的孤独。”对离默而言，孤独就是孕育作品的“子宫”，是诗人必须承担的命运。同时，我还从中读出了类似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的那种分裂式的异名孤独：“我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但最终我什么都不是。”离默也善于通过创造多个“异名”作者，将孤独戏剧化呈现为自我的精神碎片：“我总是对那些身在异乡的人/怀着崇拜。”

无论是鲁迅的《影的告别》《死后》，还是穆旦的《诗八首》《春》，抑或多多、翟永明等诗人的本土化表达，都传递出诗歌中的挣扎之音。在离默笔下，“挣扎”成为一种“诗歌生成的发动机”，它迫使语言突破优雅的境界，进入某种未驯服的领域。《器张》很典型，诗人写雨的“器张”，其实是借助柔弱飘忽的意象，赋予其强大的内在动能，让雨成为带有原始迸发力与重建意义的存在。“她们以/合围之势/侵袭一个孤单的灵魂”“她的落寞便是答案/

对抗这个复杂世界的唯一答案”，诗人在自问自答，也是在制造诗歌内部的动态景观，在“挣扎”中确认主体性。这似乎告诉读者：现代诗歌最震撼人心的，往往并非来自和谐与完成，而是发端于断裂的生命力。

至于“野性”，我想这几乎就是写好现代诗的“地心熔岩”。当今社会，全球化与数字化加速推进，纯粹的“自然”或“原始”已无处可寻，当代诗歌的“野性”更多转向语言的内部垦荒及对技术潜意识的开掘，或是在城市废墟与消费景观中寻找新的“野蛮”能量。离默的“野性”自觉，发乎本心，源自本性，非常可贵。她在《我生来就是个异乡人》中写道：“睁开眼，我从一场流浪中醒来/隐匿的河流在潜意识深处流动。”荒芜感、漂泊感扑面而来，直觉、梦境、幻觉，都在诗人笔下被神奇激活，它们找到一条隐秘畅达的路径，毫不避讳地流淌开来。在《我至少不能选择一种生活》中，诗人写“当细小透明的水珠扑向我怀里”“没有一种湿，可以如此淋漓”“我拥抱，风浪和创伤”，她将个人的勇敢抉择、生活的磨砺与周遭环境的粗粝融为一体，几乎抛弃了隐喻，回到事物本身，实则是将人性的永恒标尺推到了诗学的至高之境。

离默带给我的，不仅是纸上的美学体验，在与她的现实交流中，我还时刻感受到她身上的反叛、探索和韧劲。我想，具有这些禀赋，对于诗人持续完成诗歌的自我建构是一件好事。



## 《东门头》

主编 陈佑年  
出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1月

八闽大地上的古城众多，拥有700多年历史的福安城便是其中之一。《东门头》分为地理形胜、历史际会、街巷民生、老宅人事、名士身影等五个部分，讲述了“东门头”的水文、祠堂、庙宇、街巷、商铺、人物等。主编陈佑年带领团队深入

街巷阡陌，将城邑记忆凝练成44万字的乡土画卷。书中既有福州古城“龟鹤并峙”的形胜传奇，也有万历年间“水流福安”的悲壮往事；既重现了吴、刘、郭三姓家族的深宅大院，也记述了茶业大师吴振铎、教师刘铎等本土名人的奋斗足迹。

不同于传统地方志的宏大叙事，《东门头》开启了自下而上的民间视角。翻开本书，可见编委会成员多为古稀老人，他们带着对故土的炽热情感，耗时四年开展田野调查：叩访宗祠老人，梳理族谱碑刻，考证老字号商行，甚至为厘清明代抗倭城墙的修缮细节三易其稿。书中收录的俚语俗话如“水流福安，剩下上杭与湖山”等，为传承福安悠远的记忆起到积极作用。而在讲述老宅兴衰的篇章中，用家国叙事的手法，重现了那些年的爱国情怀。其中，吴氏五宅宅院的历史，折射出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片土地上的家族命运与民族历程同频共振。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正在隐退，而《东门头》以文字为瓦、乡愁为梁，重建了一座纸上的故乡。这是一部描述福安古邑社会史、文化史、乡土史的百科全书。

（推荐书友：陈裕）